

序：傾聽「被革命捲入者」的心靈

孫立平

這本書研究的是陝北的一個村莊，它的革命史，它的村民在革命中的日常生活，以及村民對革命中日常生活的感受。就本書最獨特的價值來說，這是在研究中國革命中還很難見到的一部關於最普通的「被革命捲入者」的心態史。

驥村，是位於陝北的非常偏僻的村莊。我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一起去驥村的時候，把村莊和縣城連接起來的還是一條遇到大雨就會無法通行的土路。革命延伸到那裏的時候，是在我們造訪這個村子的半個世紀前，其與外界交通不便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也恰恰是它的偏僻，給了人們一個極好的機會，去觀察和理解宏觀革命背景與微觀的村民生活之間關係，以及那些往往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普通人的心靈。

「對於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世紀，一系列的動蕩伴隨著一系列的革命，在動蕩與革命的交織中，中國社會發生著意義深遠的變化，中國農村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對於這樣的一段歷史進行細緻的記錄和研究，無疑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

上面的這段文字，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變遷口述資料收集計畫」開始實施的時候寫成的。它表明的是這樣一種有意識的努力：如何通過走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傾聽他們對那段歲月的感受，來更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同時更好地理解我們今天的社會轉型。

革命既可以發生在心靈的外部，也可以發生在心靈的深處。這種差別體現了革命的深度和廣度。

就社會動員的徹底性來說，中國革命遠遠超過人們經常與之相提並論的法國大革命和蘇聯的十月革命。或者換個說法，普通民衆在中國革命中的捲入，遠遠超過後二者，這是相當令人驚奇的事情。我們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常常被這樣的一個問題所吸引，並由此導致深深的困惑：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是如何進入這個革命的過程的？一個識文斷字的人成為革命的一分子，我們可以理解，那是他受到理想的呼喚；一個見多識廣的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分子，我們也可以理解，那是他在尋找一種新的生活。但在面對這樣的情景的時候，我們困惑了：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加入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他為了黨而保守秘密，叫做「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但當一個陌生的「同志」帶著組織交給他的暗號和他聯絡的時候，他就會將這個「秘密」無保留地交給這個「同志」。對於一個視家庭幾乎就是他的世界的農民來說，這究竟意味著甚麼？

在這裏，我們實際看到的是一場極為特殊的革命，它不但改造著制度，而且在改變著生活；不僅在改變著生活，而且在改變著人們的心靈。所以，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就成為這個革命的重要主題。

但問題是，這樣靈魂深處的革命成功了嗎？毛澤東畢其一生要改造農民，這個目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成功？現實的情況遠比一個簡單的答案要複雜。當人們強調共產主義革命對於人的改造，強調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過程的時候，一定要知道，這個過程遠不是「完美的」，其最後的結果，與當初的目標遠不是完全吻合的。我們在驢村的時候，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在延安成為革命首都的時候，善於造黨的驢村村民有許多就在那裏打工，但他們並不參加革命。換言之，他們只是給共產黨打工，掙共產黨的錢，但並不參加共產黨的革命。這與我們經常在革命回憶錄中看到的由於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人們競相當紅軍的情景，並不相符。

然而，如果僅此而已，事情也還是比較簡單的。這裏我要說一個我

在內心裏醞釀了很長時間的詞：「似非而是」。也就是，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的結果並沒有達到其所預期的目標，經過改造的農民也並沒有完全成為黨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新農民。現實的情況是，盲目接受的革命話語，虛偽的順從，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不同的人那裏，以不同的權重混雜在一起。記得當時一個村民講述其兒子在戀愛上的挫折的時候，用了「戀愛工作失敗」這個說法，當我們在偏僻而落後的村子裏聽到這種書面語言的時候，內心裏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觸動：現代的文明，革命的話語，相當原始的生活，以一種怪異的方式結合在一起。這是革命與日常生活的雜糅，也是革命時期普通人生活的基本底色。

那麼，互相之間存在如此巨大張力的這些因素，是如何勾連和交織在一起的呢？郭于華以一位人類學家的敏感，捕捉到了「苦」這個因素。因為「苦」既是個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正是這樣一種雙重的屬性，它成了連接宏觀和微觀、心靈與社會的紐帶。特別應當看到的是，在中國共產主義文明的實踐中，「苦」這個因素在重塑人們的內心世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訴苦」、「挖苦根」、「憶苦思甜」，曾經是普通農民都耳熟能詳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成為一種相當熟練的言說模式。

「苦」有著非常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礎。苦難，可以說是與生俱來，是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就更是如此。在驢村，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偏僻村莊，這個「苦」的概念就更與現實水乳交融，成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甚至成為理解世界的一種角度和眼光。正如郭于華所描述的，當地人普遍將在田裏幹活兒，稱之為「受苦」，如果你詢問某某人在做甚麼工作，經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農村以種地謀生。我們沒有辦法考察，這個「苦」的概念究竟是何時又是如何產生的，但我想，無論如何這是與生活中的苦難，與他們對苦難的理解聯繫在一起的。當他們平靜而漠然地、若無其事地、面無表情地使用「苦」這個概念的時候，你一方面會感受到他們的淡漠與無奈，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蘊含的巨大的爆發潛力。而革命就是喚醒這種潛力的過程與結果。

問題是如何通過對「苦」的運用造成革命的實踐，並依此來改變社會。

這裏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狀態的「苦」，是散射性的，甚至有時是很難講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將現實生活中處於彌散狀態的痛苦激活，使之成為可以傾訴和系統講述的東西，並在講述的過程中激發出其所蘊含的潛能，就成為最關鍵的一環。這時，技術，一種獨特的權力技術，就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在訴苦和憶苦思甜的過程中，黨的媒體發表了許多有關的文章，出版了很多的小冊子，傳播組織訴苦活動的技術，交流這方面的經驗。比如，在一些地方，一個自然村落中可能沒有一個像樣的地主，找不到一個可以控訴的對象，這時候可以將幾個村子合併起來舉行聯村訴苦大會；再比如，一個並不善於在大會上講話的訴苦者，講述的效果可能是很差的，如何對他們進行培訓和演練；還比如，由於某種原因，講述者的講述出現了中斷，或效果太不理想，如何用高呼口號，或將控訴對象押到台上來進行批鬥的方式維持或升高會場的氣氛等。許多研究表明，這樣的做法是有效果的。

當然，訴苦的目的是實現對人的改造。正如郭于華的研究所表明的，儘管村民們的苦難是散射性的，是深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但黨的能力就體現在，有效地將這種個人性的經歷和感受，與一個更大的範疇建立起聯繫，這就是「階級」。你的苦難，並不是你個人的苦難，而是一個羣體的苦難；而且這個苦難，是與另一個羣體，即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相聯繫的。更進一步說，「階級」其實也不是這個邏輯的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社會與國家。這樣，苦難就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範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的話語建立起了聯繫。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者一方面通過把苦的來源歸結於舊國家制度而建立起消極的國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翻身」意識等建立起積極的國家形象。而這就意味著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確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普通民衆的國家觀念的形成。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公民」形成的過程。而在中國的情況下，普通民衆是通過訴苦、確認自己的階級身分來形成國家觀念的，這種國家觀念是一種「感恩型的國家觀念」。而從

個體的角度來說，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不是如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公民」，而是作為「階級的一分子」和相對於國家的「人民」或「羣衆」。

最後不能不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傾聽「受苦人」的講述並進行研究，與革命動員中的一般的「訴苦」研究是有著明顯差別的。這種差別的主要之點在於，前者是一種主體進行主動的表達，而後者卻是動員對象的「被講述」，這一區別顯示了口述歷史研究的意義之所在。藉此，苦難就具有了另外一種力量：農民對苦難經歷的講述不僅能夠成為歷史而且能夠提供歷史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傾聽者則可藉此進入心態史的研究領域，獲得對歷史過程和邏輯的理解。也就是，透過傾聽、記錄和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農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們可以獲知一種獨特的文明——共產主義文明——及其運作的機制和邏輯。驢村「受苦人」所講述的歷史呈現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邏輯，它們不僅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作用，而且貫穿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光，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構建底層歷史與重構歷史的過程是一個講述與傾聽、理解與反思、解釋與再解釋的互動過程。

瞭解過去是為了理解現在。正如郭于華一再強調的，需要將中國過去這一段革命的歷史，作為一個文明——共產主義文明——來理解。其實，文明並不是玄虛的，它具體的體現就是組織和運作社會生活的邏輯，它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洞悉這個文明存在於日常生活，甚至存在於人們內心世界中的種種隱秘，是我們瞭解這個社會後來的轉型以及今天的狀態的基本前提。

2013年2月4日